



中国 西南民族 关系史

王文光 龙晓燕 陈 斌 / 著



DONGGUO
XINAN MINZU
GUANXI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 西南民族 关系史

王文光 龙晓燕 陈 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王文光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3

ISBN 7-5004-4993-3

I. 中… II. 王… III. 民族关系—历史—研究—西南地区
IV. 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048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625

插 页 2

字 数 430 千字

定 价 40.5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一 三星堆出土铜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铜人像，面部特征与发型差异较大，显示出古蜀国人群来源的多源状况。

（取自陈德安等《三星堆——长江上游文化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图二 三星堆出土立人像

此立人像在三星堆出土人像中最为引人注目,高贵的服饰显示出此人身份的不同一般,人像胸前及背部阴刻的龙形图案揭示出华夏文化对古蜀文化的影响。

(取自陈德安等《三星堆——长江上游文化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图三 二人盘舞鎏金铜饰

图中舞蹈者深目高鼻,其窄长的衣裤及手执似铍乐器与西域“胡人”的习俗及乐器相近,说明西汉时期古滇国与西域地区也有联系。

(取自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7 年)



图四 干栏式房屋模型

干栏式的建筑实证了百越风俗在古滇国的流行。

(取自张增祺《滇国青铜艺术》，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0 年)



图五 牛虎铜案

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的滇青铜文化精品,是古滇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其动物造型具有欧亚草原斯基泰文化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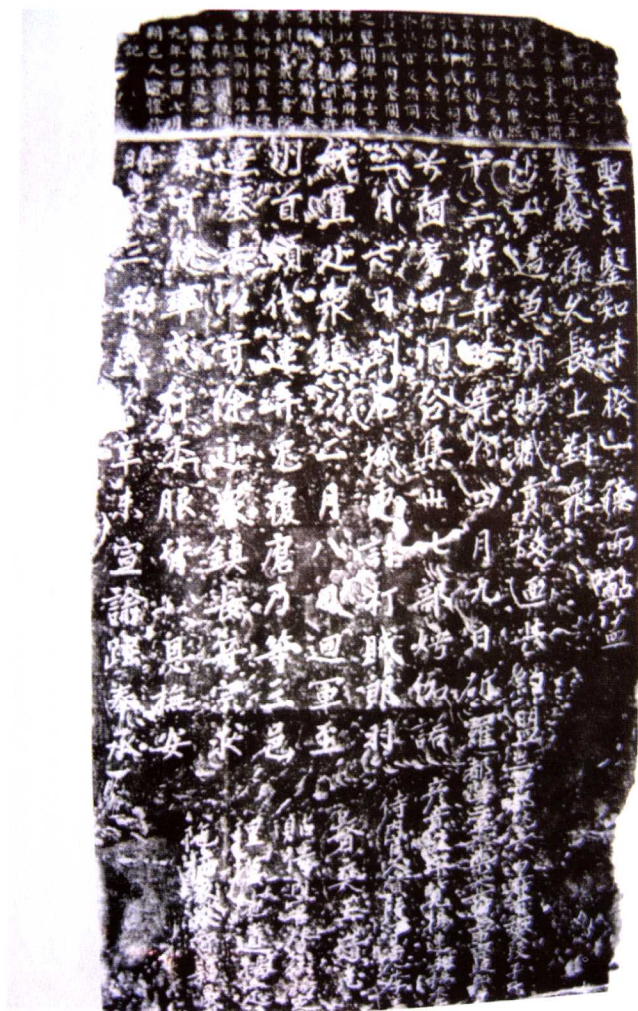
(取自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7 年)



图六 爨宝子碑

晋唐间汉文碑，碑文流畅有较高汉文功底，碑文中别体及假借字为当时流行风气，可见当时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影响。

（取自徐发苍《曲靖石刻》，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图七 大理国三十七部会盟碑

大理国内部民族关系的实证，碑文中汉文、民族文字参杂，体现出西南地区汉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况。

（取自徐发苍《曲靖石刻》，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图八 霍氏墓壁画

画中所绘人物着汉式服装和当地民族服装,表示晋时汉族人已在西南地区生活或汉文化在当地流传。

(取自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图九 郑回、杜光庭塑像

郑回、杜光庭,汉族人,同为南诏著名官员,两人在南诏国任职表明南诏国在政治制度建立中有汉文化的影响。

(取自李昆生《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序 言

按习惯的说法，中国西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西南”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而广义的“中国西南”则还包含西藏和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区。但在传统的西南民族研究中，常以川、渝、滇、黔为主。方国瑜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说：“西南地区的范围，即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这是自汉至元代我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区域——西汉为西南夷，魏晋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沿到元代为云南行省——各时期疆界虽有出入，而大体相同。”^①当然，由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与西藏、广西相邻，故在具体的研究中对西藏、广西也有涉及。

中国西南自古就是我国民族的聚居地之一，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汉族、壮族、彝族、苗族、瑶族、回族、藏族、白族、哈尼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布朗族、毛南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等三十余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些民族尽管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但都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足以让人惊叹的文化，他

^①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略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们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结成种种联系，体现出极其生动的民族关系画卷，丰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内容。

—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生存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和由生态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程度等构成了西南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背景和基础。

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中国乃至亚洲的几个主要文化区都在西南延伸、接触、交融，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显示出丰富的内涵。就中国来看，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和南方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在此交汇和碰撞；从整个亚洲来看，东亚大陆的农耕文化与西太平洋渔猎文化在这里延伸与交融。这种碰撞与交融导致了西南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西南地区多有考古发现，如三星堆文化、滇文化中都有清楚的显示。在滇国青铜器中，“铜桶、靴形铜斧等，很可能受了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斯基泰艺术和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钺等，则是仿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显然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彩色琉璃珠及蚀花肉红石髓珠等，则可能来自南亚地区”。^①正是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与作用之下，西南地区产生了发达的蜀国三星堆文化和滇国青铜文化，它们以丰富的内涵、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国乃至亚洲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文化的交流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文化的多样性也表明了西南地区曾经有过多种人群，包括外来民族的活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关于永昌

^①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地区“有闽濮、鸠僚、僮越、裸濮、身毒之民”^①的记载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汇聚在西南地区之后，他们必然要发生剧烈的碰撞，或战争或友好，或融合或分化，结成种种复杂的联系，并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西南地区山峦纵横，河流众多，既有横断山、大巴山、巫山、大娄山、乌蒙山等高山大陵，波状起伏的高原，低洼的盆地，平原和起伏平缓的丘陵，又有长江、澜沧江、怒江、红河、伊洛瓦底江、珠江六大水系的大小河流。由于西南地区山地多且地形起伏急剧，垂直变化明显，因此自古以来西南地区各民族或居于高山之上，或分布于河谷之中、山间盆地、坝区之内，相应地呈立体状分布。这样，根据他们的生态环境，西南地区的民族就有山地民族、坝区民族、水滨民族之分。而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也受所居住环境的影响，有游牧、游耕和农耕等区别，彼此之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例如从百越系统分化出来的水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和后来迁入的汉族、回族以及受汉族影响很深的白族等，多生活在山间坝子和低平的河谷盆地，他们长期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生产的稳定性强、规模大，因此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应地较高。藏、彝、羌等民族虽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化因子，仍然从事畜牧业，但与所居环境相适应，他们的经济生活已和干旱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已经兼营农业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不再按南北向的季节游动放牧，而是垂直向上下游动放牧。居住在温带、亚热带山区、半山区的拉祜族、基诺族、怒族以及德昂族等，由于所居地山高坡陡、森林茂密，没有规模放牧以及在较小范围内休耕轮作的条件，但却

^① 《华阳国志·南中志》卷4，载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0页。

有在一定区域内从一山迁往另一山的可能，再加上山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就使得他们也长期从事游耕经济，同时又兼及狩猎、采集或渔猎，处于低层次的发展之中。在以上三大类型的民族中，由于各民族的居住环境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在生产、生活诸方面相近的同时，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使西南各民族的经济生活还有特点不同的亚型。这样，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一方面导致了西南地区各民族在经济生活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活上各具特性而又并行不悖地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经济上互相依存、文化上互相影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民族关系。

二

从民族的亲缘关系来看，除汉、回、蒙古等民族外，今天的藏缅语各民族与氏羌集团、壮侗语民族与百越集团、苗瑶语族与盘瓠集团有源流关系。但民族不同于种族，它是一个社会概念。在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其他的民族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加入到其中，这些不同血缘的人们通过整合从而形成了本民族的基本文化面貌。因此，西南各民族的血缘并不是纯而又纯的，今天的壮侗语各民族与古代的百越部落共同体相比，除还具有一些文化因子，如语言上的相似性外，他们在血缘、文化等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他民族也是如此。藏缅语族民族中的白族，从有关的史料记载来看，他们是氏羌集团中的一部分与外族人口，尤其是汉族融合而形成的。据《唐会要》卷98《昆弥国》条记载，唐初的白蛮，“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自云其先本汉人”。而经历了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之后，又有大量的汉族士兵、工匠因为被俘而加入到了白

族先民当中。近代很多白族村供奉唐朝大将李宓和其他军将为本主，就充分说明了白族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明清以后，由于大量汉族进入到了西南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坝区、城镇和白族相处，在汉文化的吸引之下，滇东北、滇中的一些白族反过来又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了汉族。

由此看来，民族并不是孤立和封闭地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南地区各民族不断地发生着联系，不断地分化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各民族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复杂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在研究西南地区民族关系史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今天西南地区的回族并不等同于元代西南地区的色目人，今天的白族也不等同于秦汉时期的僰人，由色目人到回族，由僰人到白族的发展过程就是众多的民族相互接触，彼此接受经济文化生活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是一个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

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特点以自然融合为主。在西南边疆一线的民族融合大致可以分为汉晋、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前两个时期是大量的汉族融于非汉族之中，这种现象对于普遍意义的民族融合理论是不适用的，应属于一个特例。因为经典作家认为，如果征服民族的经济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就可能使被征服民族接受征服民族的经济文化而融于征服民族。但是汉晋、唐宋时期进入西南边疆的汉族人口作为征服民族，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尽管自己有先进的文化，却在众多非汉族人口的包围中，显得势单力弱，先后融于西南其他民族。史家将这一民族融合的历史特例称为汉民族的“夷化”。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民族的融合有两个特点。第一，汉族吸收少数民族，它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主动地、不自觉地融入汉族；二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部分少数民族在民族传统上有所保持，但为了避免遭受民族歧视而称汉族，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民族的假融合。第二，明代以后进

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因为通婚的原因，也有部分融入边疆少数民族之中。总之，由于民族分布地域的变化，民族聚居的状态被打破，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的变更，西南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在元代以前表现为同源异流，在元代以后既有同源异流，也有多元合流（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和异源异流（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

民族研究史上曾经流行过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说”和“战争压迫说”两种观点。这二者都是片面的，因为民族关系是各民族之间一种长期的、较为全面的关系，各民族之间既有和平友好的一面，也有战争矛盾的一面。因此，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主流便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各个领域的接触中，既和平友好、相互吸收，又矛盾冲突、相互排斥的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是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相互吸收的民族关系，主要内容为“朝贡”、互市、会盟。“朝贡”又称“通贡”，是一种由官方控制的民族间经济贸易。历史上，来自异民族国家的使节或比较重要的商团，都被汉族统治者视为“贡使”，他们所带来的物资被称为“贡品”，而相互的交换物资在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则称为“赏赐”，这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交流的特殊形式，是一种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互市是民族间贸易的主要形式，既有官方又有民间，一般多在边境开设交易市场。互市是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联系的较好形式。会盟主要体现民族的政治关系。当两个民族国家或民族政治集团长期对峙，但这种长期对峙又不利于双方的发展时，便以缔结“和约”的办法来约束双方行动，以达到重建一种有利于双方的民族关系，如唐南诏的贞元会盟。第二是以武装冲突的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关系，又分为民族征服战争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西南地区各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战争，就其性质而言，既有汉族政权为了扩大疆域而进行的民族征服战争，如公元前112年汉王朝攻破南越后，回兵